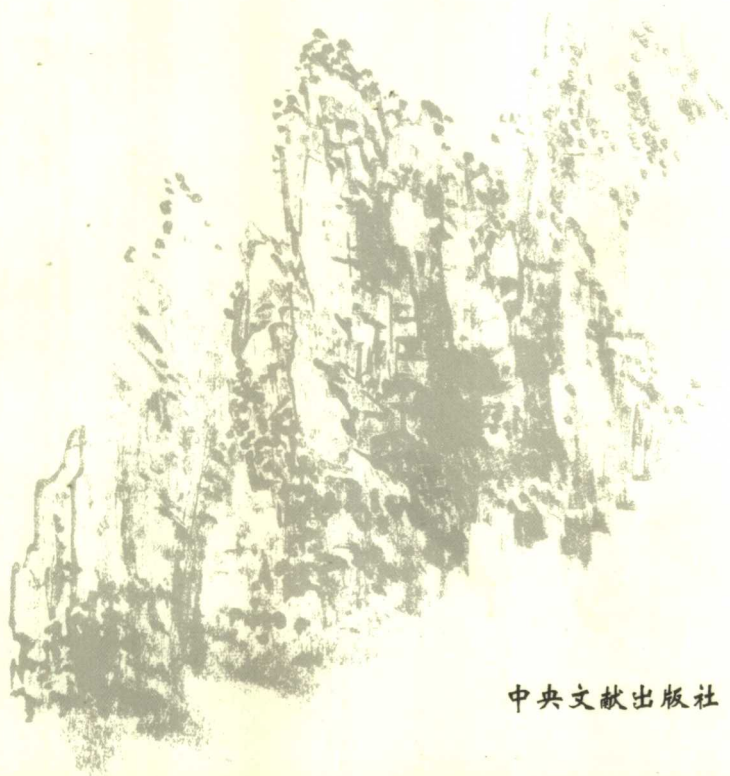


中国革命中的 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

[澳] 大卫·古德曼著
田西如 等译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革命中的 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

[澳]大卫·古德曼 著
田酉如 等译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革命中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澳)

古德曼著;田西如等译.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2

ISBN 7-5073-1491-X

I. 中… II. ①古… ②田… III.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 社会变迁 - 研究 IV. K26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5696 号

中国革命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

作 者/(澳)古德曼著;田西如等译

责任编辑/田松年

封面设计/刘友萍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方方激光照排中心

印刷装订/北京安泰印刷厂

850×1168mm 32 开 12 印张 290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册

ISBN 7-5073-1491-X/K · 647 定价:23.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中文版前言

大卫·古德曼

—

我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研究,是由 80 年代研究邓小平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及邓小平的生平历史引起的。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中国社会由于邓小平掀起的震撼世界的改革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突变。改革的浪潮引起了中国巨大的经济变革和政治变化。世界各国的眼光都在盯着年年巨变的中国,人们都急切地想了解推动这场改革的邓小平。80 年代后期,我以一个西方学者的身分研究中国南方的改革进程所引起的中国社会变化,并在 90 年代初期出版《变化中的华南》、《中国静悄悄的革命》等著作的同时,根据不多的资料,写了一本《邓小平与中国革命》。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邓小平一生中有 10 年之久的时间是在太行根据地渡过的。然而,西方有关邓小平历史的图书资料中对这 10 年记载很少。

1987 年夏季,我应邀到山西省太原市访问。太原市政

府的翟凤伦送我一本新出版的、由邓小平题写书名、中共元老薄一波作序的《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这是我获得的第一本有关太行根据地历史的著作。显然,这是邓小平认可的具有官方权威性的著作。读了这本书,我才了解到太行根据地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所处的重要地位。邓小平,这个传奇式的中国改革开放强有力的推动者,有10年时间领导着太行根据地,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地处贫脊的、封闭的、落后的太行山中的这片土地,经过一次又一次大刀阔斧的政治、经济改革,成为共产党支持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根据地,奇迹般地把分散的、贫穷的、几乎没有文化的山区农民组织起来,建立起民主政权,发展了生产,自觉积极地支持战争、参加战争,成为共产党的热烈支持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对这一奇迹,有许多西方学者曾试图做出解释,但没有使人信服的说明。而关于邓小平在太行根据地的经历,却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这样,我从研究邓小平开始,对研究太行根据地的社会变迁发生了浓厚兴趣。

1991年8月,我到南开大学参加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提交给讨论会的论文是《中国革命的太行道路:邓小平、毛泽东与变化的政治》。在这篇论文中,我提出,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的许多思想,来自当年他在太行根据地时曾实践过的经验,并举例说:“80年代改革中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责任制和党政分开都起源于太行。”我的这一观点,得到与会的一位学者的重视。他在讨论中除赞同我的上述观点外,还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他的看法。

我从讨论会上的论文中翻出他写的《论太行根据地的社会性质》。这是一篇具有独到见解的论文。他认为邓小平在太行根据地通过一系列改革,使太行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性质已经起了质的变化。这位学者,正是我前面提到的《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一书的主编田酉如教授。我到他住的房间去登门拜访,我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并且得知他任总编的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编委会正在编辑出版一整套《太行革命根据地历史丛书》,有十几本,上述史稿仅仅是第一本。他邀请我到山西访问,并提出请我到太行根据地所在的各地市县村去实地考察,找当年的老人采访,进一步对太行根据地进行研究。我很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会中,主办者有一项到太行旅游考察的项目,我报名参加了。此次旅游,使我第一次领略了太行山的雄伟险峻,但由于是集体行动,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看涉县、左权两地的几个景点,未深入考察。此后,田酉如教授将他主编的太行革命根据地历史丛书陆续寄给我,使我对太行根据地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93年8月,田酉如教授和南开大学的魏宏运教授应邀到澳大利亚参加由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学会主办的中国学术研讨会,我们在一起进一步讨论了太行根据地的历史,他们极力主张我到太行各地进行深入的考察。我们商定,1994年夏我到太行考察。在我去太行前,先由我的研究生瑞雪·墨菲到太原,跟随田酉如教授学习,帮助我收集资料。在田酉如教授的帮助下,瑞雪·墨菲为我从山西省档案馆、山西省图书馆等处收集了许多有关太行根据地的资料。此时,我正在写《邓小平

政治评传》，并商定由田酉如教授组织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这一阶段对太行根据地的研究，依靠的主要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所保存的图书、报刊、档案资料。从这些资料中，使我对太行根据地的社会变迁有了初步的了解。

二

我对太行根据地社会变迁较为深入的研究，是到太行老区各地考察，并采访了当年太行根据地的一批领导者和民众之后。

1994年5月，我应山西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邀请，第三次到山西，重点去太行老区进行考察访问。在山西，由于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的支持、山西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热情接待和田酉如教授的精心安排，使考察和采访得以非常顺利地进行。

经过这次实地考察采访，我深感只靠文字资料研究太行根据地历史是远远不够的，为此，在这年的7月，我第四次到山西，代表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与山西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签订了《合作交流意向书》，将研究太行根据地历史列入合作的项目，决定进行时间较长的研究。1995年11月，我第五次到山西，代表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同由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新组建的山西省史志研究院正式签订了《交流合作协议》，确定两院正式建立友好关系，继续将研究太行根据地列为合作项目，并新增加了为期3年的

《改革中的山西》研究项目。这一协议,再次得到胡富国书记的支持。根据以上协议,我于1996年至1998年先后7次到山西,一边继续进行太行根据地的研究,一边开展《改革中的山西》项目研究。从1987年第一次到山西访问,到1998年的12年中,我12次到山西,在11个地市、37个县(市)区进行了考察和采访,其中在太行老区的左权、武乡、黎城、涉县(属河北省)、榆社、和顺、昔阳、平定、阳泉、榆次、太谷、祁县、长治、潞城、襄垣、晋城、阳城17个县市多次进行了实地考察和采访,使我对太行根据地的地理环境、人文历史、战场形势、民俗风情等,都有了亲身感受。各地的中共党史研究者、地方志纂修者为我提供了许多当地的资料。

在这期间,我在北京采访了原中共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宣传部长张磐石、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原晋冀鲁豫边区农会主席池必卿;在太原采访了原太行区专员贾云标,曾担任过太行区中共县委书记的霍泛、李修仁、王庭栋等。从这些领导者口中,对太行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历史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对共产党在太行根据地进行各项社会改革的方针、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及经验教训,有了更具体的了解。从这些太行根据地的精英人物身上,使我看到了当年共产党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是怎样把广大民众,特别是山区农民发动组织起来,一边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边教育、提高、改造农民,使农民成为补充军队力量的主要来源,使农村成为抗战的主要基地,并在太行区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使太行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根本的变化。

三

深入探讨和研究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的过程,是我研究的重点。我的想法是,将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发展与建设放到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背景中去考察,在把握战时特殊环境的同时,着重探讨根据地内部的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过程,特别是有关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此,我选择了太行根据地内的3个县:辽县(即今左权县)、武乡、黎城,作为更深入研究的重点。在战争环境下,民众的动员、民主政治制度的推行、经济建设的组织,基本上是以县为单位进行的。根据地的社会变迁,也主要反映在各个相对独立的县的范围之内。在中国,自古以来,县的区划与县政权的设置,是以自然地理、家族集团、风俗习惯为依据的。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在根据地内设置县政权、划分县的管辖范围时,既照顾了历史上的县域,又考虑到县政权所能管辖到的村庄,以便于组织民众参战、支前,便于实施民主政治。战时的每个县,就是一个相对独立活动的小社会,每个县的社会变化,都具体反映整个根据地社会变迁的进程。这就是我为什么将县作为单位来研究根据地社会变迁的主要原因。

我选择的辽县、武乡、黎城,在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很具有典型的意义。从战略地位上看,3个县处在太行山的制高点,太行区的腹地,向东出击可控制冀西,直指平汉铁路;向北可抗击从正太路南下进攻根据地的日军;向西可向同蒲铁路沿线的日军发动攻击;向南则紧守上党盆地,预防日军

向太行山深处进攻。3个县内既有群峰壁立的太行屏障,又有沟壑纵横、山河交错的雄关险塞,历来是太行山中易守难攻、进退自如的兵家必争之地,又是天然的游击战场;从物产上看,3个县既有丰富的煤、铁等矿产,又有山货土产,还盛产粮食、油料、干鲜果品等。正因为如此,八路军开到华北抗日前线后,将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及中共太行区党委驻扎在这里,使其成为指挥领导华北抗战的枢纽。共产党在抗战中制定的一系列改革方针、政策、措施,总是先在这里贯彻实施,取得经验后再向其他地区推广,因此,这3个县又被中共太行区党委确定为“实验县”。邓小平在太行10年间,有相当长的时间住在这3个县,直接领导了各项社会改革和各项建设事业。至今,在辽县、武乡,保留着八路军总部曾驻扎办公的旧址,在黎城保留着中共北方局召开著名的黎城会议的会址和八路军总兵工厂的厂房。在武乡城内,还建有一座雄伟的、有着丰富资料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为了研究这3个县,我2次到辽县、2次到武乡、3次到黎城。书中所引用的资料,有许多是在考察、访问中获得的。

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的研究,并不因为出版了这本书而中止。我在今年到山西时,还将到太行山中去考察、采访,继续我的研究工作。这一研究,对于我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我特别感谢中央文献出版社能够为我出版中译本。中央文献出版社不仅在中国是一个很有影响、具有权威性的出版社,而且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有知名度。我和我

的许多朋友都是该出版社的热心读者,在我的藏书中,就有该社出版的图书。这些书已成为我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资料。

2002年2月19日

序

山西的历史研究者常将山西历史描述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部分。山西是 1937—1945 年期间对日斗争的前线，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的许多地区建立了政权，在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创立了根据地，保障了中国人民的后方安全，抵御了日军对华北的侵略。在延安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大批干部横渡黄河到达山西，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为以后进行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强大的组织力量。

地处晋东南的太行根据地是最重要的根据地，它最初是由八路军一二九师创立，后逐步发展为晋冀鲁豫边区。它不仅是华北敌后创建最早的边区之一，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而且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邓小平自 1938 年 1 月担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后，在领导以太行根据地为中心的晋冀鲁豫边区的工作中，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领导人。在这里，邓小平在毛泽东领导的抗日战争中，表现出了独特的才能。

太行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尽人皆知的，这在 50 年代出版的两本书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先研究根据地或边区的出版物之一是齐武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晋冀鲁豫边区概况》，这本书于 1957 年出版。齐武现已离休，解放后曾在《工人日报》社工作，“文化大革命”以后，为中国社科院历史学家。他的许多同事在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都在太行根据地和晋冀鲁豫边区的相应部门工作。另一本书是伊莎贝尔和大卫·克罗科编写的《一个中国乡村的革命》(中文版叫《十里店》,十里店是当时太行根据地武安县的一个乡村)。他们一个是人类学家,一个是教师,对抗日战争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感兴趣,最后作为“外国专家”在北京教学。

然而,50年代后期,在毛泽东执政的年代,太行根据地的历史与其说是受到了抹煞,倒不如说是受到了忽视(实际上在中国其他地区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如此)。中国人可能知道太行根据地的名字、地理位置,但别的更多的事情就不知道了。实际上,他们知道的太行根据地和晋冀鲁豫边区的人和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没有对这一地区作出进一步的研究。国外学者很少明确了解太行根据地和它的历史。因此,他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曾经是农业生产样板的大寨、红旗渠、西沟都位于太行根据地,他们后来的创业成就归功于战争年代积累的经验。

1987年,我访问了山西省省会太原,作为临别礼物,主人赠送一本书给我: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辑的《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它吸引人的地方有两点:书名由邓小平(中国卓越的领导人)本人亲自书写,我非常惊奇。按照传统,题写书名的人一般都与书中描写的主要事件有关联,即和人物、事件、观点有联系。同时,我被书中描述的详细的历史所吸引。邓小平和太行革命根据地间的亲密关系促使我写一本传记,书名为《邓小平与中国革命》(1994年修改后再版被译成中文时书名为《邓小平政治评传》)。

由于中国经历了多种变化,许多外国研究者在中国收集对同一事物描述的各方面的材料进行了几十年的时间。在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大量从事抗日战争历史研究的外国学者,已经强调并提出对不同的革命根据地及他们的经验的重要性,应该区别对待。然而,直到80年代后期,一部宽银幕纪录片公开了中国自己的历史,它使得准确研究这一典型历史成为可能。实际上它也使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成为可能。在这时,我开始研究革命中的中国社会变迁,并选择抗日根据地作为研究对象。我认为,根据地的社会变迁是革命奋斗的结果。

在本书中,研究的中心点是抗日战争期间太行根据地的3个邻近县的革命变迁过程:辽县(它的名字在1942年9月改名为左权,是为纪念在那年5月牺牲的中国共产党的左权将军)、武乡和黎城。选取这样狭窄的地理位置为中心点研究的原因,一是因为通过调查可以形成大量的材料,二是因为渴望能了解这些地方的发展变化。辽县、武乡、黎城这3个地方是太行根据地的中心,也是太行山南部海拔较高的地区。这些地区不仅为根据地共产党和抗日武装补充大量的新鲜血液,而且也是根据地和边区进行组织活动的场所,并且和涉县(现在在河北,而当时在河南)相连。它还是太行根据地印发文件、保存档案材料、接见客人的地方。

在阅读本书前,对一些必要的名词术语进行解释说明,或许对那些不太了解抗日战争期间华北共产党历史的人来说是有用的。

本书一般情况下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汉语拼音翻译名

词术语,而不是把中国文字翻译成罗马文字。此外,1949年前北京称为北平,这在这本书中也采用了。

名词术语如“边区”、“游击区”、“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历史中几乎从本质上就分不清界限。边区通常比“游击区”和“根据地”大,通常包含“游击区”和“根据地”。根据地通常包含共产党统治的地区和对日军进行游击战的基地。战争期间,边区有一个边区政府(如晋冀鲁豫边区),它是国家政府的一级政权。根据地的概念是松散的,虽然它们是军事活动和抵抗运动的主要区域。游击区这个词用于指越来越多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和政府扩大到了的区域。根据地的最高领导机构常常是中国共产党的地区或区域的委员会,它们后来确定为根据地的核心领导力量。

在游击战的条件下,特别是1937年到1938年间,由于中国共产党力量迅速扩大,力量增长的速度随时发生变化。“边区”、“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概念几乎意义相同,在中国国内大部分地方这几个词可以互相代替。在某个具体区域或后方采取的军事行动,很难确定是中国共产党的当地政府还是军事组织发动的,很难区分是边区还是根据地提供的帮助。根据地建立后,合并成为边区的一部分,它又成为不太安全的游击区,在抗日战争时期随时都在发生变化。

就太行地区而言,设法作出确切的解释是重要的。“边区”是1941年中期首次用来特指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地区相联接的根据地的。1941年8月以后,“边区”包含四个区域: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根据地。太行根据地包括晋东南地区的一部分,处于晋冀鲁豫边区的中心位置。太行根据

地是边区政府所在地,在所有边区中力量最强大,直接由边区政府管理。由于太行根据地在边区发展中起着摇篮作用,有时把与太行根据地相关联的区域也称为“太行区”(当时的文件也这样称谓)。虽然太岳根据地是独立发展的一个区域,有时也混为“太行区”的一部分,因为1939年中期以前和1942年9月以后,太岳区的中共党组织由中共太行区党委和中共太行分局领导。

更复杂的事情是中国共产党在太行根据地的领导有多种说法:冀豫晋省委(1937年10月),晋冀豫区委(1938年8月),晋冀豫区党委(1939年4月)和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太行区委员会(1943年10月)。这种混乱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语言上造成的,二是组织管理上造成的。中国共产党在管理上多是使用“区”这个词,“区”可以指某一地区、行政区和某一范围之内,可以是一个地方,也可以是多个地方的组合。打算夺取某一阵地,先要向与之相关的不同级别的管理组织写申请报告,报告先交根据地下级组织,最后交到至少相当于根据地政府的组织批准。1938年8月中共晋冀豫区委会被指定为行政区委员会,1939年4月确定为区党委会。“区”也可作为县的下属,相当于“乡”,整个管理组织由上到下为边区、行署、专区、县、区、村。

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已经认识到太行根据地不同发展时期组织管理的连续性。例如,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会议,要求这些委员中每一个人都参加,而不管在整个战争中这些委员会领导成员是否有变化。《战斗》是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太行根据地很著名的出版物之一,它的出版有连续的期

号。在战争时期,太行根据地所有部门以及在相邻的晋东南地区,党的各级组织都倾向于非常信任这一刊物的文字。

边区这个名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日本人都对该区域有影响而命名的,它包括两个或多个区域相邻的地区。因而山西—河北—山东—河南边区是位于4个省的交界处,而不是4个省的全部。习惯上,边区的名字用代表每个省的典型特性的字来描述。因此山西—河北—山东—河南边区经常称为晋冀鲁豫边区,山西是晋,河北是冀,山东是鲁,河南是豫。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地区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为八路军。八路军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而得名,下设3个师——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到1937年底国民党要重新编排八路军时,八路军已发展壮大,家喻户晓,遍及整个华北地区。一二九师被派往晋东南,成为晋冀鲁豫边区新型军队的主要力量。

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正规军、游击队、民兵。一二九师就是太行根据地的主要军事力量。当然,随着战争的发展,新的部队不断增加,使正规军发展壮大。正规部队大部分由游击队、自卫队来补充。每一个强壮的群众都可以作为自卫队的一员。当地的自卫队员即民兵,通常从当地青壮年中选出,正规军则选自地方游击队队员。

在晋东南,新军(决死队)和八路军并肩战斗。新军是由牺盟会建立的一个地方性群众抗日部队。牺盟会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简称。阎锡山是山西的战前军阀,尽管他忠实献身于国民党,但他最初对国民党比对共产党防备更甚。